

德育丛书

跨越时代的沉思

四川教育出版社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title '跨越时代的沉思' (Reflections Across Eras) enclosed in a blue-outlined hexagonal frame. The background is composed of numerous thin, light blue lines radiating from the bottom towards the top. The bottom portion of the cover is decorated with a pattern of vertical blue bars of varying heights, creating a barcode-like effect.

跨越时代的沉思

四川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韦其珉
封面设计：张子云
版面设计：王 凌

跨越时代的沉思

（德育丛书）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排版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8.5 插页4 字数16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ISBN7-5408-1225-7/G·1193 软精定价3.33元

出版说明

“德育丛书”系资料性读物，集中编选了有关德育的一般基础理论和参考资料，力图使读者对德育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和轮廓性的了解，以适应德育教学和研究以及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这套丛书从1983年开始出版，第一批出了五种，第二批出了三种，今后还将陆续编辑出版。

本丛书是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教委的领导下，由“德育丛书”编辑委员会组织省内的高等院校编写的。编委会顾问为胡晓风，主编张凤山，副主编卢自德、张润瑞、张明锦，四川教育学院受委托具体组织这项工作。

本书的作者有四川大学阎钢、江源秀，四川省委宣传部李晓翔，成都体育学院陈伟以及其他院校或单位的陈宏、郭娅、彭长卿、雷晓坤、阎昭武、杨宗平、聂卉、金鹰、余常德、邓履群、袁拥学等同志。作者在教学或工作之余，采访笔耕两年，成就初稿。尔后，送请张凤山、张明锦、姚文忠等同志审订，并请陈克纯同志统阅了全书，提出了修改意见。最后，由阎钢、李晓翔、陈伟协商整理、修改统稿成书。

1989年12月

1989年版序言

胡晓风

《德育丛书》系1982年开始组织编撰，1983年出版，1987年再版，书目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又将出第三版了。当初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的德育体系，为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服务。这将要经历一条艰难曲折而漫长的道路。经过将近七年来的努力，总算可以起步了。当时我们曾经讲过，德育能否形成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将取决于客观的社会需要和德育工作发展的水平。

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以全球范围的改革、调整为标志的转折时期，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相互关系，将是决定德育工作乃至教育如何向前发展的客观社会需要。德育工作的发展水平也将取决于对这种客观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德育科学化也只有在满足这种客观社会需要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启迪思想、调节行为的特殊作用。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长期以来，我们坚持只能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德育指导思想的主题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因而要求人们实现革命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另一社会经济形态，在历史长河中，它们有继承的关系。同时，社会主义是指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它的尽头，这个制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因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又是同处一个历史时期。

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两种制度。一方面是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它们有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关系，也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和平演变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存在。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决不能忽略这一方面。德育指导思想的主题将让位于人类的和平与世界的发展。共处必须平等，竞争需要公正。因而必然要求人们为实现高度民主化的社会而奋斗。这是德育科学化面临的一个重大变化。包括德育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都有一个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再认识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进一步充实德育内容和改革德育方法。新的德育体系才能赖以建立。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因为社会理想、发展模式与教育目的总是各不相同的。德育与之有直接关联。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这三大类就是封建主义的道德、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他还说：“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2页）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影响必然渗透到学校教育整体的各个方面，贯穿于德育整体之中。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这是指德育的特殊性，这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特殊规律。

恩格斯在作出上述论断的同时还讲到另一方面：“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同上书）这里要注意恩格斯指的一是“同一历史发展”的时期，而不是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二是“经济发展阶段”，而不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说，人们在社会里除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还有另

外许多群体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些相互关系也要受相应的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所制约。针对受阶级斗争制约的特殊规律而言,这里讲的就是指不受阶级斗争制约的一般规律。德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同时存在于德育的统一体内,德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在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的时代里,总是容易强调特殊规律;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就更要强调一般规律。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善于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德育是学校教育所特有的概念,是培育青少年追求美好理想的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学校教育的目的决定德育的内容。学校教育的目的又往往是与办学者的社会理想相吻合。不同的社会理想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和不同的德育内容。德育最能体现教育目的和办学者的社会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育是学校教育的核心。

从原始社会解体,正式学校的出现,教育开始从其他活动中分离出来。英文School(学校)源于意为“闲暇”、“休息”的希腊语Skhole,这表明当时的学校是唯有摆脱了劳动的贵族才享有的一种特权。他们闲暇无事,就关起门来办学校,研究和制定他们相互关系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研究统治劳动人民的“治人之术”。到了封建社会又蒙上了宗教的色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认为全部教育都应围绕着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完善的人这一最根本的问题进行,德育教育是最根本最首要的任务。他在1804年发表的《论世界的美的启示为教育的主要工作》的著名著作中写道:“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最高目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259~260页)他提出了“德育、教育的唯一整体”的重要命题。这是正确总结了历史发展变化而得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这是和当时时代相适应的教育思想。历史上和时代相适应的教育思想都是单一的教育目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需要而进行了以劳动为目的的教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类为了享受需要而进行了以伦理道德或宗教为目的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

社会，人类为了满足发展的需要，相继进行了以文化、科技为目的的教育。这种单一的教育目的的演变，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全世界所有的教育改革，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把劳动、德育、文化与科技结合起来，以满足社会和人生的综合需要为目的，以培养合理的人生为宗旨。

赫尔巴特并不认为德育是孤立存在着的社会现象。他把决定德育内涵的教育目的分为选择的目的与道德的目的两个部分。选择的目的即可能的目的，指教育可以帮助人们选择职业和确立对事业的追求，指“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道德的目的是必要的目的，必须“在儿童心中发展明辨的识见以及与之一起的相应的意志力”。（同上书272页，273页），这是道德教育的首要事件。可能的目的和必要的目的是互为条件的。他坚持德育是全部教育的核心，必须贯彻于教育过程的始终。他并且确定教育过程的不可动摇的顺序，即管理、教学和道德教育。德育方法就是实现以他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性格训练。赫尔巴特的命题尽管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赫尔巴特的道德观念也必然受到他所处时代的阶级局限，但他揭示德育在学校教育以及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教育过程的顺序、德育方法等等，仍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我们讲德育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总是从与智育、体育、美育几方面协调全面发展为条件的。和智育、美育相对而言，德育和体育则是全面发展的基础或前提。

赫尔巴特反对单纯的教育目的，他也反对单一的道德观。他强调道德的整体性，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具有“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或报偿”五种道德观念，缺一不可。（同上书第298~299页）尽管这些内容都还值得探讨和研究，但强调德育的整体性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从德育整体、教育整体乃至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之中，吸取道德的营养，帮助青少年自觉地树立正确的社会意识，自觉地规范有益于自己又有益于社会的行为。

教育的价值在于创造，教育的过程即是创造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但愿《德育丛书》，善于总结改革中的新鲜经验，在教育过

程之中,把握住德育这个核心,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在创造性思维、创造性学习中,选择和确立自己的职业或事业,并准备进行创造性劳动,创造新价值。德育为本,创业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德育学一定会在改革中问世。

胡晓风

1989年春节于成都

目 录

一	坎坷的道路，追求的人生·····	1
二	朝霞与晚霞并美·····	9
三	我的求学生涯·····	17
四	识途老马忆征途·····	22
五	梅花香自苦寒来·····	42
六	学无止境，志存高远·····	49
七	一位女干部的自述·····	56
八	为共和国的诞生奉献青春·····	62
九	人生，播种在戈壁滩·····	67
一〇	离开了事业便没有精神支柱·····	77
一一	一生坎坷，壮志不已·····	84
一二	关键在于做了什么·····	89
一三	创伤虽多意越坚，直与天地争春回·····	94
一四	作一个自觉的、有作为的德育工作者·····	99
一五	抓住命运的缰绳·····	110
一六	我的事业在祖国·····	119
一七	是共产党给了我的一切·····	124
一八	赤心报春晖·····	130
一九	崇高的信仰 不懈的追求·····	139
二〇	在数学王国里辛苦地耕耘·····	144

二一	站在历史的枝头微笑·····	152
二二	思接千载，情系三国·····	163
二三	正确对待自己，奋力拼搏·····	168
二四	理解——社会的凝聚力·····	173
二五	一切取决于自己努力的程度·····	180
二六	史学园地里的一株新苗·····	185
二七	小荷才露尖尖角·····	191
二八	我希望做一个弹簧·····	199
二九	一个大学学生的忏悔·····	204
三〇	阵痛·蝉蜕·····	215
三一	应该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	223
三二	步入大学的感叹·····	229
三三	青春漫话·····	237
三四	幸福畅想曲·····	244
三五	雕塑·成熟·超越·····	251
	后记·····	259

一、坎坷的道路 追求的人生

黄瀛。男。1906年出生在我国的山城——重庆，曾经是较有名气的诗人、将军，现任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

〔在他的脚下，走过的是一条布满荆棘而又坎坷的人生之路。目前，他除了教学、带研究生外，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一至四届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等等。他现在虽已达80多岁高龄，但精神抖擞，步履矫健。正值早春的2月里，我们怀着一种探究的心情采访了他。〕

求学东瀛

我的父亲是清末举人，早年长期留学日本，便娶了一位日本的姑娘为妻。后来，我的父母定居重庆，我就是在这座美丽的山城降临人世的。我6岁那年，随父母迁居日本，便在日本度过了我的求学生涯。

1926年，我进入日本文化学院学习。日本当时正处于“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护宪运动”和民主势力高涨，我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并结识了许多文艺界的左翼朋友，思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开始接触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从小喜爱诗歌，特别酷爱我国唐代的诗歌。在大学期间我常常用自己刚刚接受的一些新的

思想、观点去观察生活，进行诗歌创作。从16岁开始，我就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受到社会的好评，说我给日本诗坛“带来了新的诗风”，并获得《日本诗人》杂志授予的“日本诗人赏”的殊荣。东京BON书店和东京鸟羽书店先后出版发行了我的《景星》和《瑞枝》两本诗集，而我也被收入《日本文学大辞典》和《日本现代诗辞典》中。虽然 I 获得了一般日本人所不能获得的荣誉，但我时刻不忘我是中国人，是炎黄的子孙、龙的传人。我虽身在日本，可我的心却时时向往和关注着我的故乡。为寄托我的思乡之情，我大量翻译了郭沫若、蒋光慈、闻一多等进步诗人的作品。在介绍和传播中国进步诗人的诗歌过程中，我结识了田汉同志，后来我们成为挚友。记得有一次，田汉同志约我到小说家佐藤春夫家去，在摆谈中，田汉同志问佐藤日本文艺界对我有什么看法，我的作品在日本有什么样的影响？佐藤说：“黄先生目前在诗坛很活跃，将来还可以在日本诗坛大展宏图，成为了了不起的诗人。”由于我在日本诗坛的这点小名气，使我能为旅日华侨中的进步学生做些事情。有一次，华侨学生与日本当局发生冲突被抓去40多人，我为营救他们奔走呼号，并及时给他们送去被盖、生活用品等，在大家的努力下，日本当局被迫释放了被关押的旅日华侨学生。

投笔从戎

在文化学院毕业后，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次大转折。我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走文学道路搞诗歌创作成为诗人，而是跨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回想起来，作出

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受一种报国心的支使。我想：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弱国，中国人在日本很受欺侮，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军队。我弃文习武或许能对国家有点用处。恰逢此时日本出兵济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我当时义愤填膺，一气之下便写了一首诗《日本军队从中国滚出去！》，在当时日本唯一的左翼文艺杂志上发表。

1931年，我抓住机会随我国到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的代表团回国，回到了我阔别已久的故乡。从此，开始了我近20年的军人生涯。先是在南京军事委员会工作，任上尉参谋，主要负责对日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我就在国民党主要人物何应钦处当翻译，搞宣传。由于我在日本的时间较长，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所以，我在电台上的对日宣传引起日本朝野的惊恐。日本电通社、共同社等就此造谣说我死了，而且说是因为我有反战思想，被蒋介石枪毙的。事实上，由于我的宣传工作出色，先后被任命为：“陆军特种通讯大队”少校教官、中校队长、上校总队长等职。

抗战胜利时，我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少将特别高级参谋”的身份，随何应钦到湖南芷江接受冈村宁次的特使今井武夫少将带来的投降书，从事受降工作中的翻译接洽事宜。后来，又任国防部第二厅少将代理主任专员。抗战结束后，我亲身体验和目睹了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变得心灰意冷，一度打算离开军队。汤恩伯、马崇六等多次劝阻，我又留了下来，直到1949年在贵州起义。那时，我任国民党19兵团46军289师少将副师长。

深切的怀念

我在日本和回国后，一直和文艺界的共产党人和左翼文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如李初黎、冯乃超、田汉、廖梦醒等。但是，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还是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我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在南京工作，经常到上海内山完造先生那里去聊天。一次内山完造先生问我是否认识鲁迅，我说：“早就知道，但还未见过面。”谈话间流露出遗憾之情。内山完造先生说：“鲁迅先生早就注意到日本文坛上有一位叫黄瀛的中国青年诗人，很活跃，有才华，思想也比较进步，鲁迅先生曾向我打听有关您的情况，他知道我认识您后，托我给他安排和您见见面。”我听说鲁迅先生想见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即答应下来。1933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在内山先生开办的书店里见到了鲁迅先生。

这天，鲁迅先生身穿棉长袍，态度和蔼可亲。我们围坐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摆谈。一见面，鲁迅先生就说：“早就听说您了，见到您很高兴！”在摆谈中鲁迅先生提到我在日本左翼杂志《文艺战线》上发表的诗作，对我的正义感和勇气表示赞赏。和鲁迅先生摆谈起来，倍感亲切，无话不说。从日本谈到中国，从中国又谈到日本。当我谈到弃文习武时，鲁迅先生一再惋惜地说我这种人不应当军人，应该搞文学，从事中日文化交流。鲁迅先生还给我分析了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横光利一、增田涉等的为人和他们的作品。话题一转，鲁迅先生问到了我在日本的生活情况和发表作品的稿

酬。我回答说：在日本生活倒还可以，但发表一首诗的稿费不多，八块钱。最后，鲁迅先生建议我将《聊斋志异》翻译介绍到日本去。这次见面之后，我慎重地考虑了鲁迅先生的意见，准备翻译此书。后来因有人已开始着手翻译这本书，我才作罢。

我与鲁迅先生的接触，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有人把我的—些活动报告何应钦，我的这位亲戚一直都认为我不像一个军人，说我是个“怪物”，曾多次给我打招呼不准同鲁迅先生等文艺界人士来往。我的顶头上司军政部交通司长邱炜则当众给我提出严重警告。在这样的背景和限制下，我和鲁迅先生的接触减少了，最后竟连与外界人士交往的一点自由都没有了。记得我和鲁迅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时，鲁迅先生知道了我的情况和我所处的困境，心情十分沉闷，一反平常侃侃而谈的场面，我们相对无言，默默地呆了好一阵子。我看见鲁迅先生的烟快抽完了，就借机出去买了几听高级香烟送给他，以表示我对先生的尊敬和惜别之情。鲁迅先生沉默良久之后对我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这个人真坦率……你不该当军人。”说完鲁迅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和鲁迅先生分手后，就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他了。

在我和鲁迅先生的交往过程中，鲁迅先生曾多次提到我不该当军人。当时还以为鲁迅先生是因为我弃文而感到惋惜，真正懂得鲁迅先生这句话的含义，还是在临近全国解放，我们起义之前。当我所在的部队溃退到贵州郎岱一带的途中，看到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的狼狈相，听到老百姓的一片咒骂声，这时，我才认识到我这位将军的结局与我投笔从戎的初衷其差异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啊！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有人要挟

我去台湾，我执意不从；贵州保安团提出给我100现大洋，一担鸦片，要收买我去当师长，也被我断然拒绝了。这事气恼了保安团，于是他们就以这100大洋、1担鸦片作为悬赏，要我的人头。在诱惑和威胁面前，我耳边回响着鲁迅先生的话语：“你真不该当军人，应当一个为民造福之人。”就这样，使我从矛盾中解脱出来，在水城宣布起义，等待刘邓大军的到来。这一明智的选择使我站到了正义和光明一边。我深深地怀念和感谢鲁迅先生，是他帮助和引导我走上了一条光辉的人生之路。

并非是终点

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后，我被送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两年，后来以转业军人的身份回到我的出生地重庆，开始了一个旧军人的思想改造生活。那时，我虽已是50多岁的人了，但为了改造自身的陋习，我什么活都干。我从事过街道伙食团的会计工作，到民办小学代过课，还当过搬运工，虽然生活清苦些，但觉得很踏实。田汉同志经常关心我，1961年我生了一场大病，田汉曾从南京给我寄来20元钱，并来信叮嘱我，如有什么困难可找三十年代的左翼文人、解放后任重庆市市长的任白戈同志。我想，像我这样的人，能得到人民政府的信任已很不错了，所以，即使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去找过一次任白戈同志。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我同许多正直的人们一样也受到磨难。1966年秋的一天，一辆堂皇的小轿车开到我的家门口，两个